

当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海师大中文系业余教育教研室

说 明

一九七八年九月间，在上海师大召开了部分省市高校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材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许多老作家特地赶来作了报告。我们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已经本人审定）印成集子，给学员们在学习《当代文学史》时参考。

中文系业余教育教研室
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

1979年3月

目 录

- 一、夏征农同志的报告（综合）……………（ 1 ）
- 二、刘金同志的报告（综合）……………（ 16 ）
- 三、吴强同志的报告（小说）……………（ 40 ）
- 四、王西彦同志的报告（小说）……………（ 59 ）
- 五、柯灵同志的报告（电影）……………（ 78 ）
- 六、陈恭敏同志的报告（戏剧）……………（ 98 ）
- 七、姜彬同志的报告（散文）……………（ 120 ）

夏征农同志的报告

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写好当代史，有便利的地方，那就是许多事情都摆在面前，不象古代的东西，面目渺茫。从土里面挖出来的材料，到底有多少可靠，也很难讲。现代的东西，事实俱在，讲起来就比较容易。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增加了许多困难，给我们设置了许多禁区，增加了我们许多思想的顾虑，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搞好，首先要解放思想，不要怕犯错误，要敢于冲破各种禁区，要有这种精神。先不讲正确不正确，也不管有没有各种各样的非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本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反复讲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现在提出来，也有人反对。

“四人帮”把人的思想禁闭了，是非都乱了。有些人就辨别不出是非，即使正确的东西也会有人反对，何况我们很难保证每句话都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要搞好这部书，要突破许多框框，打破许多禁区，不要怕人家批评，不要怕犯错误，这一点，要有思想准备。我们力求少犯错误，这就要有认真负责的精神，科学地对待这个问题。第二点，就是要尊重客观的事实。因为你们是写当代文学史，就要尊重二十多年来文学工作的实际情况。“四人帮”歪曲历史事实，捏造事实，这是给我们设置的一个障碍。他提出来一个所谓“古为今用”，怎么才算“古为今用”？把古代的人装扮成是现在的，把

现在的人装扮成是古代的人，这叫做“古为今用”？歪曲历史来适应政治上的需要，这不是“古为今用”，这是“四人帮”的帮道。我们的“古为今用”是要从历史的事实当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使得我们有所借鉴，受到教育，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来。歪曲历史事实，能不能够使我们得到有益的教训呢？不可能，只能得到错误的教训。比如说，广东有一位写了《简明中国哲学史》，原来的那本我觉得还可以的，后来因为要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服务，这样一古为今用，那就糟糕了。我就记得这么一条：说秦始皇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杀人太少了。从这点吸取教训，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杀人越多，越巩固，越好。林彪、“四人帮”要的就是这条教训，为他们篡党夺权，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制造理论根据。他们惯于伪造历史歪曲历史。捏造一个法家，说是革命的，捏造一个儒家，说是反革命的。要打倒你，就说你是儒家，他们自封是法家，是“革命家”。法家是什么，法家就是主张镇压的。当然在一定的時候它有作用，但从整个历史看，他们主张的就是镇压。镇压，这是适应“四人帮”的需要的。我们学校有个刘大杰先生，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就受这个影响，弄得乱七八糟。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四人帮”是有目的的，但我们搞科学的人，搞历史的人，首先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随着政治上的风向转。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真理来源于实践，结论是从实践当中来的。先得出结论，然后再去找事实，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这是起码的常识。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事实，从事实当中引出结论来，而不是先有结论，然后去找事实，去凑合你事先定下来的结论。这实际上体现了你是唯物主义地研究问题，还是唯心主义地研究

问题。这一点要引起大家注意。这股风，这种流毒，现在还存在，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意见，有材料，不等于就有了结论。一个社会总有各种各样的事，事物总是错综复杂的。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积极的，有消极的；各种各样。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武器，认真细致地对具体材料进行具体分析。首先要有材料，但是你光有材料还不行。我们过去的许多文学史，基本上搞的是收集材料的工作。有一个解放之前我的历史教员，他写了很多历史书，我看了之后，感到都是一些资料的堆砌。这就要求我们化功夫，开动脑子，细致地分析。比如你们讲的十八年、二十八年，文学的发展是不是有“左”倾？这二十八年是不是都正确的呀？还是“左”倾？还是右倾？这不能抽象地来讲，只有根据具体材料来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分析。是不是有？我认为肯定有，有左有右，但是什么时候什么是主要倾向，什么时候是次要倾向，这就复杂了。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高潮掀起了，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原因，接着又来了一个浮夸风、命令风，不是带来了扎扎实实的工作，真正地把经济促上去，而是带来了浮夸风、命令风，还有什么共产风，那是“左”的倾向。文学创作上有没有这个情况？有的，我们写了很多作品是好的，但是也有什么每个人都写戏，每个人都写歌，每个人都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有点浮夸了。我们中国有许多民歌，但真正的民歌也不是每个人都写得出的，这就有一点浮夸了。在浮夸之后，右的倾向出现了。古的都是好的，古董非常吃香。我们有些老干部，古画根本不懂，但都要弄一两张挂在那里，很好笑，这是一股风。为什么其它的都

是向前进，唯独文学艺术是古的好呢？这不是怪吗？文化艺术也是向前发展的。古代的东西应该放在它那个历史时代去评价它。我们研究它，是为了认识文艺发展的规律，从中吸取对我们创造当代文学有益的东西。不能说它比我们现在的都好。现在为三十年代翻案是对的。三十年代有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打破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文化专制主义，这是很艰苦的。林彪、“四人帮”认为三十年代都是黑的，抹杀三十年代，这完全是错误的，是为了打倒一切，把一些在三十年代经过考验、奋斗出来的一批文艺工作者打倒。但是对三十年代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三十年代参加左联的大多是小资产阶级，而这些作者也是抱着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创作的。尽管他们主观上是想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我写过几十篇描写农民的小说，现在来看，都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情绪来描写农民的。文化大革命前有一个时候说，三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要向三十年代学习，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三十年代我们党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同时又是处在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压迫下，所有进步的东西都受到摧残，怎么能说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呢？当然，应该肯定那个时候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在那个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社会的黑暗面，鼓舞工农小资产阶级起来反抗。比如《渔光曲》、《大路歌》、《桃李劫》等，在当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现在满足于这些就不行了。在那个时候好象一切都是三十年代的好，以后来了个倒转，“四人帮”就把它翻过来，一切都禁止，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反复。你们要解放思想，又要认真细致的分析。每一个作家，每一个作品，每一个时期，都要作分析。

不能够因人废事，也不能够完全脱离人。“四人帮”就是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对一个作家，对一个运动，对一个事情，要看它全过程，要整个的全面地看，哪一点是行的，哪一点是不行的；在某一个时期他是对的，在某一个时期他是不对的；哪一些作品有积极的意义，哪一些作品有消极的意义。有一些老作家，因为世界观有一些问题，所以他一个时期写出来的作品很好，有积极意义。有时写的作品并不好，没有什么积极意义。比如郭老，这是我们最崇拜的作家，二七年，失败之后，他写了一篇小说，讲一个人在大革命时把一只手断掉了，怎样携同爱人拥抱握手跑到上海来。郭老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历史学家，但也不能因此就说每一篇作品都是好的，有缺点还是要指出来。同样，某个人历史上、政治上反动，是好人变坏的，也不能因此就把他过去本来还好的作品都否定了。政治同艺术是有关系，但是也不是那样分不开来的。他某个历史时期在政治上虽是反动的，但是可以写出一些对历史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作品。托尔斯太就是这样，他政治上是反动的，是保皇的，但是他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当时俄国的黑暗面，所以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对他作了全面地分析。我们呢，就不是这样，不是全面否定，就是全面肯定托尔斯太。这不符合实际，这就是没有分析。江青搞的那些“样板戏”到底怎么样评价哪也是要分析。这些“样板戏”基本上不是江青搞的，她之所以要抓，是捞取政治资本，因为她懂得，在别的地方她插不进手去，从文艺戏剧方面打开缺口，企图首先占领文学艺术这个阵地，以便以后篡党夺权，所以她不是真正要搞什么戏剧革命。但是就戏剧的本身来讲，她是

花了一点力量的，因为她要打开缺口，夺取这个阵地，她一点力气都不花，能行吗？列宁讲，在俄国革命的时候有一个叛徒，混入布尔什维克里面，当上了中央委员，后来发现了，他逃走了。列宁就分析说，这是个特务，出卖了我们几百个人的生命，但是他为什么得到信任，因为他为当时布尔什维克主义做了一些事情，沙皇的时候，东西不能出，经过他的手，可以印杂志，送到外国和俄国本国来发行。如果他不做这些事情，他就不可能取得布尔什维克的信任，就不能爬上中央委员的位置。所以江青为了得到信任，欺上瞒下，打进来，占领这个阵地，才有资本混入领导集团去。当然我们知道她这个假的，她是利用这个东西，但是对那些戏剧的本身不能够全部否定。从他们搞所谓“戏剧革命”这个问题来讲，我们要揭露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利用这个搞篡党活动，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她搞阴谋，把戏本身也全否定掉了，说都是毒草，不能这样讲。有几个戏弄到那样，是花很大功夫的。我开始搞了一段，后来她不要我搞了，因为我们意见不一样。虽然她反对我，但我还是承认她有一段时间是花了一定功夫的，后来就不行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全面否定，现在这些戏都不演了，我不赞成。过去那些禁止的戏剧都公演了，这很好，但是也不要捧得太高了，要适当地评价。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一分是就讲一分，两分是就讲两分，不要绝对化，对一切都对，错一切都错。每个戏，每个人，每个时期，整个的运动，整个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都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够绝对化，不能够是就一切都是，非就一切都非。也不能够因人废事，人与事有联系，也不能够因人废事。文艺同政治有联系，但不能够就把文艺同政治等同起

来。如果那样，就很难理解历史上许多文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称赞过的巴尔扎克、托尔斯太等很多人，那些人在政治上都不是同情无产阶级革命的。李贺的诗，主席是很欣赏的，李贺又不是一个革命家，但思想很丰富，我不喜欢他的诗，看不懂，不知道他讲的什么，因为他幻想丰富，气魄很大，主席很欣赏，认为大家应该看他的诗。他死得早，政治上到底是什么态度弄不清楚，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同情当时人民群众的作家。毛主席对历史的文学的东西懂得很多，他对李贺的诗很欣赏，但不是欣赏他政治上的革命，而是欣赏他的文艺作品。在封建社会，一切都否定，中国历史就没有办法写。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有推动历史进步的一面，也有拉历史后退的一面，两股力量在斗争。你要写清楚，哪一种力量对历史的前进有作用，哪一种倾向是拉历史后退的。清官贪官，是不是有区别？从群众这方面讲，有区别，群众总还是喜欢清官的，歌颂清官的，但是你说清官比贪官还坏，这个总归是不行的。这不是我们高兴不高兴的问题。大体上的情况，这些事情，政治同艺术，是有联系的，但又不能够联得那样，政治标准是一个标准，艺术标准，又是一个标准，不是一个标准。毛主席说，首先从政治标准看，政治标准就是说，它对历史起推动作用呢？还是起促退作用？促进还是促退？拿这来判断的。关于其它的一些问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这些林彪“四人帮”把它一棍子打死，说是反党的东西，这肯定是错的，是林彪“四人帮”制造的重大冤案之一。这涉及到社会主义是不是允许有讽刺文艺的问题。我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够拒绝讽刺的，因为社会主义也有消极的东西，只有消除这些消极的东西，社会主义

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所以不能排斥讽刺文艺。难道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滔天罪行不应该揭露吗？难道旧社会的流毒如家长式领导、官僚主义等不应该讽刺吗？现在有一些人一讲到文化大革命的缺点错误，哎呀，就认为会否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否定毛主席的领导，这是完全错误的。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在两年来，确确实实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这个大好形势下面，还存留着许多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有许多搞乱的是非标准，没有完全搞清，歪曲、篡改、伪造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完全把它恢复过来。最近，复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写了一篇《伤痕》，引起了争论，据说北京也在争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篇小说会引起这个争论呢？就是因为怕把文化大革命中的“伤痕”暴露出来，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这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不是一篇小说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是不是应该揭露的问题。这是放在你们面前设置的禁区、障碍。你们要有勇气通过这个障碍，才能够恢复历史的原来面目。

中国的当代文学，分三个时期：一个是五八年以前。一个是五八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六六年以前，后来是“四人帮”统治的时候。可以说，比较好的作品都是前八年搞出来的。那些作品，大多数是写的抗日战争，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不可能很多，写民主革命的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文艺反映社会，往往要过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当然也有些思想倾向成问题的作品，但不是很多，我看不出来。毛主席批评了《清宫密史》、《武训传》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都是抗日战争胜利

之前搞的，拿在那个时候放，当然有问题。文学研究当中，评《红楼梦》的胡适、俞平伯，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批评了这些东西。这都不是主流。到了五八年本来是一个大好形势，各方面都呈现蓬勃发展的现象。但是，在胜利面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膨胀起来了，也叫做“胜利冲昏头脑”。有些领导干部骄傲自满起来，以为要怎么样干就可以怎么样干了，群众观念忘掉了，掀起一股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中国社会有两个最顽强的最坏的东西，一个是封建的东西，一个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封建的东西流传了几千年，特别在思想意识方面，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由于封建的思想意识作怪，产生了个人说了算，家长式领导。我的话，就是圣旨，你不能够违抗，他讲你这块地要打一万斤粮食，你说不行，就把你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这连资产阶级起码的民主也没有。毛主席发表的文章说，老虎屁股摸不得。不仅不听群众的话，而且群众提了意见，就压制、打击。所以造成干部说假话，看上面的态度行事，欺上压下成风。庐山会议以后，这股风更加刮得厉害，而且没有停止过。还有一个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绝对化，浮夸风就是这样来的。文艺上也是这样，人人写诗，人人作歌，结果反过来破坏了生产，挫伤了群众积极性。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文艺要革命，戏剧要革命。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有这个东西，批示一下，我们有一些干部对社会主义的戏剧、文学就热心了。但也要做具体分析，虽然当时存在一些不好的倾向，也还有些应该肯定的东西。话剧汇演，京剧汇演，还有戏曲汇演，到底应该怎样来评价？应该说，它对贯彻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的方针，起了一些作用的。江青所以要把我们打倒，也有这样一个问题

在里面。因为我们比她走在前面，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就搞了。她呢，是六四年才开始，她要当文艺革命的“旗手”，就不允许我们存在，你们跑在我前面，我这个旗手就当不成了。她说自己是戏剧革命的旗手，戏剧革命，文化革命是从她开始的。后来连中国革命都是从她开始的了。我现在这样讲，肯定这一点，不是因为我参加了当时的工作，我们当时同她有分歧，“百花齐放”，话剧要搞，戏剧要搞，京剧要搞，为此，还写了篇社论，这个同她的思想很抵触，我们首先搞话剧，她再搞话剧没有意思了，所以她就抓住了京剧，要一切服从京剧。京剧的改革，也只许她搞“样板”，她要一花独放，我们要“百花齐放”，这就是当时我们同江青的分歧。京剧是一个古老的剧种，艺术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也有它的缺点，公式化形式化，反映现代生活比较困难。话剧演现代戏是不成问题的。地方戏曲虽然在艺术上比较粗糙，但是它同群众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提出三者并重。她反对这个，她只要搞京剧，讲话剧、戏曲都是毒草，都不准搞，她要树立她这个“旗手”。至于华东汇演的许多戏，那是有好有坏。比如拍成电影的《龙江颂》，还有山东的《丰收之后》，是比较好的戏。京剧里面，戏曲里面也有比较好的戏。但是也有些不好的戏。戏剧艺术上的，政治上的缺点都有，但是主要是艺术上的缺点多。不是个个写得好，大多是中等水平，有少数不好的戏，也有少数好的戏。对每个戏剧的本身来讲，要具体分析，对整个的文艺运动来讲，应该肯定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一个大的曲折，特别是在文学艺术上。江青他们全都是文人出身，自然科学，同我一样，一

点都不懂，文学这个东西，懂得一点，历史也是不懂的，不过在上海抓住了几个人。上海的朱永嘉是学过历史的，是她的打手。北京的周一良、冯友兰等都是她的顾问。她就把文艺阵地作为篡党夺权的起点。所以文化艺术遭受的摧残特别大，人也打得多，所有三十年代留下的人都打倒了，没有一个不被打倒的，写过一些好的作品的人也都打倒了。所以五八年到文化大革命有两个反复。他们首先窃取文艺这块阵地，文艺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开端，林彪同“四人帮”结合，也是从文艺开始，就是部队文艺座谈会。张春桥、姚文元是在北京戏剧汇演开始结成帮派的。部队文艺座谈会，进一步与林彪挂上勾，结成篡党夺权的一帮。在文艺座谈会上抛出黑线专政。当时我们提了些看法，认为这个提法不妥，说是十四年来我们文艺工作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当时疑心大概是弄错了。当时我们想不清楚，明明是毛泽东思想领导的，为什么会是黑线？我们相信周扬，因为周扬是代表党中央，来领导文学艺术的。明明是毛泽东思想占统治地位，怎么会是黑线专了政，不理解。当时华东局有个杂志，要登，我们不让他登。我说，这个不能公开讲，也许是党内可以讲，公开不可以讲，我不准他讲。现在知道，这是个阴谋，是个伏笔，为后来打倒一切文艺界特别是三十年代过来的文艺界的老前辈伏下了一笔，说这些人是黑线的。他们是善于看风使舵，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人，伪装拥护戏剧革命，拥护文化艺术的革命，拥护毛泽东文艺路线，一步一步篡夺文艺事业的领导权，进一步窃取文革的领导权，代替中央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要讲原因，这是一条。另一个阴谋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他们把文化

大革命篡改为“改朝换代”。因此党委就都是走资派，都要打倒，都要靠边，造成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没有领导，他们可以随便把那些牛鬼蛇神，地富反坏，打砸抢者，流氓盗窃分子都收集起来，作为他的队伍，篡夺各级领导权。这个阴谋很厉害，颠倒敌我关系。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刚刚讲过的，缺乏民主，民主生活不正常，所以能够让他们为所欲为。他们掌握了职权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践踏党纪国法。毛主席是我们大家都尊敬的领袖，毛主席所以得到我们的敬爱，是因为毛主席领导了我们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说过，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不是相信马克思这个人，而是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对毛主席也是这样，丝毫没有存在着迷信，盲从的东西在里面，不应该有这个东西。林彪“四人帮”就利用毛主席在我们党里面崇高的威信，来宣传迷信盲从，“句句照办”，“一句顶一万句”。不适合于他的，他可以丢掉。还利用毛主席在我们广大干部、群众中的威信，把毛主席神化，把毛泽东思想变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思想武器，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教训。毛主席曾经讲：“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就是挑动武斗，他们说这也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因为毛主席讲过，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这句话对不对，对的。但是，这是当革命的时候，是我们还没有取得政权，三座大山还压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要推倒三座大山，所以必须要用暴力。今天反动阶级已经推翻了，今天我们的国家是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吗？不是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嘛！怎么可以把这个话用到现在来呢？！但是他不管。他可以打你，怎么样都行，因为这是推翻一个

阶级的暴力行动。我们这些人都是代表剥削阶级的，等于毛主席也是代表剥削阶级的，因为我们这些人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嘛，领导的嘛。我们的社会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专政嘛。还有伪造的，比如说“全面专政”。现在查明，这个话根本就不是毛主席讲的，是他们假造的，是陈伯达写在文章上面，伪造的，打了几个圈，后来就变成了黑体字。因为过去习惯，黑体字都是毛主席讲的，慢慢就变成了毛主席的了。张春桥那篇文章，就是彻头彻尾用法西斯专政的理论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什么都要专政，连我们脑子里的什么东西他都要专政，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相反的嘛。但是我们受他们的骗，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迷信，只要说这是毛主席讲的，我们就相信他。只要他那上面讲是毛主席的，有些人即使看出来这个不对，也不敢讲，因为讲了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就不得了哩！林彪讲的，要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那还了得。你要讲一句“不”字，他就可以把你杀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在中国非常要紧。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还有一条，就是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现在情况是不是有变化呢，多少有一点，因为农民已经集体化了，但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还是很大很多。比如农业虽然集体化了，但是还是手工业生产方式，生产技术还是很落后，生产水平生活水平低，因此农民还有自发势力。如果农业机械化了，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了，自发倾向就会消除。我们这个学校，实际都是小资产阶级，过去不是批判过“知识私有”，

如果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提高，知识私有是批判不倒的。因为人们的文化相差悬殊，他懂得你不懂，一些人有了知识，许多人还不识字，有什么办法消除这种私有呢？青年学生是好的，很纯洁，很热情，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是他们太单纯，没有经验，只有一个朴实的爱国心，爱社会主义，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因而，引导得好，就可以成为一股巨大的冲锋力量，如果引导得不好，有坏人把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煽动起来，那也不得了，林彪“四人帮”就是这样搞的。毛主席早就提过，要把知识青年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引导到无产阶级轨道上来，是一个经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认为“四人帮”林彪能够搞这样久，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不是不能分析的，是可以分析的。主要的是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流毒，长期形成的一些东西，还没有完全清除掉。你看，那时候，林彪想做皇帝，江青也是想做皇帝，他们就是封建残余势力的总代表。家族主义、帮派体系，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封建的东西。现在，他们把大家的眼擦亮了，觉悟提高了，这也是一个大的收获。下一次，如果有人再搞那一套，我看就不会那么容易。老实讲，现在不管是哪一个人讲话，我们都要琢磨琢磨一下，不会再那样迷信盲从。中国社会从来缺乏民主，要发扬民主，也有阻力。比如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有人反对，但是大家是清楚的。有人不准讨论，但是下面还是讨论。连一个普通工人都看出来，到底对不对，都要考虑考虑，评论一番。所以现在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文化大革命，如果还有人要重复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是办不到的。我们